

广州:首批外来工公租房开放日遇冷

限制较多、交通不便、宣传不足是主要原因

本报实习生 唐丽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文/图

5月13日到5月15日,广州市向外来工开放两处公租房房源点,这是广州市首次向外来工推出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共600套。记者现场采访了解到,公租房开放日期间,前来看房的外来工并不多。

环境好租金低

公租房开放参观时间为5月13日至15日上午9时至12时,下午1时至4时。

5月14日是周六,上午11时,记者在龙归花园看到,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广州市住房保障办设置的咨询处停留,三位工作人员完全应付得过来。参观的人领取了公租房相关资料后,前往样板房参观。记者从工作人员介绍中得知,5月13日是开放日第一天,过来看房的外来工也不多,基本是街坊来看热闹。

据了解,本次600套拟分配房源,其中白云区龙归花园有264套,黄埔区瑞东花园有336套。“小户型供应更多一点,一房型、一房一厅型、两房一厅型共有553套,三房一厅大户型的占47套,针对来穗务工人员家庭人口分配。”其中龙归花园的户型最多,四种户型齐全。“公租房设在这两个区主要是考虑到外来工比较多而且集中。”咨询点的工作人员解释道。

这批公租房面积最小的一套32.06平方米,最大的一套63.11平方米。按照12元/平方米的月租标准和申请人收入资产等标准计算,龙归花园公租房月租最低的一套区间在304.66元至402.19元,月租最高的一套租金区间则在735.96元至757.32元。另一处位于黄埔区的房源瑞东花园月租金则为23元/平方米。

在龙归花园一套三房一厅的样板房内,一对夫妇正在朋友的陪伴下参观。他们告诉记者,相比之下,白云区的龙归花园比黄埔区的瑞东花园更好,小区大,环境舒服。“花草树木又多又整齐,楼与楼的间隔也很适宜。”

为何鲜见外来工?

据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官方网站3月8日公布的数据,目前广州市登记在册来穗人员790多万人。来穗人员的住房问题一直以来是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向外来工提供公租房本应该是一件让他们欢欣鼓舞的大事,但是从目前反馈来看,环境好、租金低的优惠条件吸引到的外来工并不多,问题出在哪里?

在龙归花园住宅楼梯口处负责登记来访人数的物业工作人员分析,参观的人不多,和交通不方便有很大关系。“我负责的这栋楼第一天大概有50个人过来看房。毕竟交通不太方便,公租房面向的是外来工,出去工作不方便,就会影响他们过来看房的意愿。”小区居民也表示,居住环境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周边超市和公交线路等配套设施还跟不上,生活和外出上班多有不便之处。

该小区内设有龙归城公交总站,记者看到,站牌上只显示有三条线路,其中只有一条线路可以到达广州地铁站点嘉禾望岗站,居民想要借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市区相当不便。

根据《来穗务工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摇号分配指引》要求,两类务工人员可以申请承租市本级公共租赁住房:一是来穗时间长、稳定就业的中低收入务工人员,并同时符合居住登记期限、社保要求、就业登记以及一年可支配收入符合规定等多项条件;二是高级技能人才或受表彰、获荣誉称号的来穗务工人员,并同时符合第一类对象的多项条件。面对这些限制,外来工的喜气减少了一半。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广州市内的外来工,天河区某建筑工地上的一位姓赵的工人直言道:“申请条件太麻烦了,一大堆资料和证明要搞,不会使用网络,不会去弄。”赵工已是花甲之年,在广州工作的20多年里,他一直在建筑工地干活,接的大多是散活,月收入不固定,一般在1500元至3000元之间,一直没有社保。最近几年,他租住在广州越秀区小北路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单间,月租600元。赵工表示,就算条件允许也不会考虑去申请公租房,“那些房子太远了,我骑自行车去干活就不方便了。”

按照《指引》陈列的申请条件,30多岁的湛江人植氏夫妇刚好勉强进入到申请对象的行列。在龙归花园一套向阳的三房一厅的房子里,植太太挪不开脚了。“如果我能搬到这套房子,就太好了。”植太太和丈夫已经在广州工作了11年,得知符合本次公租房的申请条件,来参观的前一天,心急的植太太已经把申请公租房的相关材料按照《指引》的要求准备好了。“今年听到面向外来工开放公租房的消息,在申请条件那么多限制的情况下,自己刚刚好符合,我感到很高兴,你看那一本厚厚的《指引》,达到申请的条件一点也不容易。”

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工作人员表示,5月19日公租房正式开始网上申请,如果申请人数确实比较少,会考虑采取其他一些信息传播手段,让惠民政策真正发挥作用。



5月14日,几名外来工在龙归花园现场咨询。

房屋租赁新政出台,推进“公租房货币化”,将外来工纳入保障范围

北京:三个农民工家庭的公租房期望

本报记者 杨学义

5月4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措施。对于公租房,会议提出要推进公租房货币化,政府对保障对象通过市场租房给予补贴。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等凡符合条件的应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对此,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几处农民工聚集地,探访在此居住的农民工的租房生活,并了解他们对公租房的期望。

“能享受到公租房,会有归属感”

在北京南二环天桥的一家快餐店,刘玲玲麻利地收拾好杯盘狼藉的桌子,向门外新走来的顾客吆喝:“欢迎光临!”她操着一口地道的京腔,如果不是深入接触,谁也不会想到她是一名来自山西农村的女孩。

“我5岁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北京生活。”刘玲玲的父亲在北京及周边的建筑工地已奋战了20个年头,母亲做过餐厅服务员、洗碗工,她年幼时,同奶奶在农村老家生活,后来奶奶去世,她被父母接到北京。多年来,他们一家三口长期租住在天桥的一处胡同里,过着清贫的日子。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到,发展住房租赁产业,支持利用已建成住房或新建住房开展租赁业务;推进公租房货币化,政府对保障对象通过市场租房给予补贴。而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表示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要“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这些对常年租住在北京的刘玲玲一家来说,无疑是好消息。

刘玲玲说,由于长期在胡同里租住,他们一家已与街坊四邻打得火热,多年来留在北京工作、生活,与邻里和睦也有一定关系。“房东是一个特好的人,当家里接济不开了,从来不会催促房租。街坊四邻从来没有给过我们一家异样的眼光。”刘玲玲认为,此次房屋租赁新政出台后,自己若能享受到公租房,就对北京更有归属感了。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只有15%的人想在城市定居,40岁至50岁的为21%,30岁至40岁的为37%,20岁至30岁的为45%,20岁以下的为61%。可以看出,越是年纪小的农民工越渴望留在城市,农民工子女很大程度上从内心想成为城里人。

“家乡,在我心里已是他乡,每逢回老家过年,我反而觉得是在出差。”由于特殊的成长环境,刘玲玲已经适应了北京,并决定在北京继续未来的生活。

如今,刘玲玲找的男朋友是北京人,并期待进一步发展。“我舍不得这里,这里有我的过去,现在,我也要把它奉献给北京。”

“期望房租低一点,能租得起大点的房间”

在北京市东北五环崔各庄乡东辛店村的中心街道上,矮楼林立,电线交织,两三处工地上的工人们正在进行紧锣密鼓地施工,车水马龙的街道上不时有运送建材的大卡车穿行,尘土飞扬……这是记者5月6日看到的一幕。

“这里更像城乡接合部”,王凯对记者说。他是一名常年在北京建筑工地上施工的山东小伙,租住在该村的一间公寓中。他来北京工作快7年了,两年前,家乡的妻子带着3岁的儿子来到北京同他一起生活。“现在工友们都很羡慕我。”王凯得意地说。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公布最新抽样调查结果:在常住外来人口迁移原因方面,2015年“来京就业”依然占到了县图书馆,其实这个文化中心是过马营镇查乃亥村农民工南拉先个人自筹资金修建的。

在图书室,光从图书的分类和所藏书籍就可以看出,南拉先对筹建图书室的用心和对其寄予的期望。到目前,图书室累计投入资金31万元,购置图书5万余册,征订报纸杂志40余种。另外,还修建了砖木结构图书室9间。

南拉先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牧民,小时候家里十分贫困,没上几年学便辍学在家,经过很多年外出打拼终于摆脱了贫困,日子也蒸蒸日上。

2000年,南拉先依旧忘不了自幼所受文化知识贫乏之苦,心里念着村里的父老乡亲们,为了不让乡亲们眼界增长知识,利用科技致富,当年他便从自办空心砖厂盈利的5万元中拿出2万元投入到图书室项目建设。

自图书室建成以来,当地越来越多的农牧民走进图书室,学习文化知识,了解科技知识和时事政策,村镇里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读书看报学理论、学知识的多了,喝酒、打麻将的少了;学科技、用科技的多了,搞封建迷信的少了;关心经济发展、国家大事的多了,不文明的言行少了;做贡献、比素质、改陋习的多了。”南拉先欣喜地说。

每天早上9点图书室开门后,文化中心周边的学生、村民们都会到这里读书、学习、查阅相关资料,去图书室看书逐渐成了村民们的日常所需。

对于此次出台的房屋租赁新政,王凯告诉记者,自己不奢望能享受到“公租房货币化”等政策,只是希望房租能低一点,可以租得起一间稍微大点的房子供一家三口住。

在妻子没有来到北京之前,王凯和工友一同住在工地上,如今他的生活范围已经从狼藉的工地扩展到生活气息浓厚的城中村,虽然租住条件差、一间房很拥挤,但“找到了家的感觉”。

“好政策儿子能享受就好了”

在北京市东南三环十八里店乡小武基村的一家幼儿园校门前,簇拥着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其中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引人注目,他骑着一辆堆满硬纸壳的三轮车,脸上和双手上都有黧黑的泥垢。老人叫郑宝庆,是来接孙子的,5年前,他从河南来到了北京。

10多年前,郑宝庆的老伴下地干农活时摔伤,造成瘫痪。儿子当时在北京,给开汽车修理店的舅舅打工。郑宝庆选择将老伴送至北京,“一方面为了治病,另一方面儿子主动要求接到身边照顾。”于是,郑宝庆决定北

上,和家人团聚,“我想照顾老伴,给儿子减负”。去年,老伴去世后,郑宝庆在离儿子不远的小武基村内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并开始自谋出路,有活就去建筑工地干活;没活就骑着三轮车在村子周边捡废品,维持生计。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与2011年相比,2015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17.9%,总数已达4966万人。而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步入老年。

“我不想成为儿子的负担!”郑宝庆告诉记者,他今年已经62岁了,有两个孙子,儿子和儿媳的收入也不高,无力赡养他。但他不仅不能拖累儿子,还要帮助儿子分担压力,于是他承担起了两个孙子上学接送任务,力所能及地帮助儿子一家。生活虽然辛苦,但也还算幸福。

在北京工业大学的一项调查中,有51.3%的外来农民工认为工作生活压力大,但仍然有41.4%的外来农民工认为现在的工作生活状态幸福。

“是否希望住上公租房,享受公租房新政?”面对记者的提问,郑宝庆表示自己已无所谓,如果这么好的政策能让儿子享受就好了。

(应被采访人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

农民工自筹资金创办文化中心

“学知识的人多了,喝酒打麻将的少了;学科技的多了,搞封建迷信的少了;关心国家大事的多了,不文明言行少了”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苏烽

“惠民政策类、文化类、历史类、传记类、藏文文献类……”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过马营镇民族文化中心270多平方米的图书室,书架上分门别类整齐地摆放着各类书籍,其中不乏二十四史、藏文史籍、藏文小书、英文名著等稀缺书目,不了解的人还以为到了县图书馆,其实这个文化中心是过马营镇查乃亥村农民工南拉先个人自筹资金修建的。

在图书室,光从图书的分类和所藏书籍就可以看出,南拉先对筹建图书室的用心和对其寄予的期望。到目前,图书室累计投入资金31万元,购置图书5万余册,征订报纸杂志40余种。另外,还修建了砖木结构图书室9间。

南拉先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牧民,小时候家里十分贫困,没上几年学便辍学在家,经过很多年外出打拼终于摆脱了贫困,日子也蒸蒸日上。

2000年,南拉先依旧忘不了自幼所受文化知识贫乏之苦,心里念着村里的父老乡亲们,为了不让乡亲们眼界增长知识,利用科技致富,当年他便从自办空心砖厂盈利的5万元中拿出2万元投入到图书室项目建设。

自图书室建成以来,当地越来越多的农牧民走进图书室,学习文化知识,了解科技知识和时事政策,村镇里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读书看报学理论、学知识的多了,喝酒、打麻将的少了;学科技、用科技的多了,搞封建迷信的少了;关心经济发展、国家大事的多了,不文明的言行少了;做贡献、比素质、改陋习的多了。”南拉先欣喜地说。

每天早上9点图书室开门后,文化中心周边的学生、村民们都会到这里读书、学习、查阅相关资料,去图书室看书逐渐成了村民们的日常所需。

通过图书室,南拉先给农牧民带来的可不只是这些“硬知识”,在图书室旁的一间屋子里,摆满了堆绣、唐卡、刺绣等各种类型的藏式手工艺品,琳琅满目。

“这些作品都是学员们的作品,农牧民通过培训制作藏绣和石雕工艺,既有了额外的收入,又能把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下去,现在每年文化中心都会举办三期农民工技能培训班,平均参加人次达370人。”南拉

先说。

图书室和藏绣、石雕技能培训班只是南拉先民族文化中心丰富农牧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和带动农民工致富的一部分。在文化中心走廊的展览牌上,还记录着南拉先多年来组织周边村民开展藏歌比赛的一幕幕场景,从脸盆、铁锅、茶壶到电视、冰箱、摩托车,这些奖品也见证了藏歌比赛的变迁。

现在,南拉先的民族文化中心以图书室为龙头,涉及电脑、英语培训、电影放映、民俗实物展览、藏歌比赛等文化活动,已成为过马营镇乃至贵南县创建“文化宣传中心户”的样板。

“我还计划利用当地民族文化资源,组建一支农牧民文艺演出队,通过逐步在省内外出演,进一步增加乡亲们的收入。”南拉先说,今年还购置一批象棋、跳绳、乒乓球、台球桌、健身器材等文体娱乐设施,把图书室为主的文化中心办成“宣传政策、科技培训、文化娱乐、信息网络”为一体的致富阵地,不断满足广大群众的科技、文化、信息需求,让当地的农牧民得到更多、更实在的精神文化享受。



沈阳:1.45 万名“快递小哥”成“平安志愿者”

5月17日,沈阳市公安局组织开展的全市快递人员“平安沈阳文明出行”活动启动仪式在苏家屯区公安局举行。

为服务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沈阳警

方深入走访寄递物流企业,推出便企惠企举措,助推寄递物流企业健康快速发展。仪式当天,全市1.45万名“快递小哥”获“平安志愿者”身份。

黄金崑 摄/视觉中国

浙江农村留守儿童“一人一档”基本完成

据《青年时报》5月16日报道,目前,浙江省民政部门已于4月底前完成新一轮排查摸底,留守儿童“一人一档”基本完成。此前,民政部门已将留守儿童纳入困境儿童帮扶范围,并建立了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将无人抚养、自身残疾或患重病的农村留守儿童纳入儿童福利保障范围。

【点评】全国究竟有多少留守儿童?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今年3月透露,此前使用的都是估计的数字,我国今年将首次摸清留守儿童底数。而摸清留守儿童底数需要各省的积极配合和努力,浙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新一轮摸底工作,动作之快值得其他省份学习。只有摸清了留守儿童数,实行“一人一档”,才能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有针对性地开展救助和帮扶工作。

(点评 杨召全)